

明初的三位“北京市长”

明代初年的北京城,经历了从北平府北平城到顺天府北京城的过渡,明代的都城也经历了从南京到以北京为主的两都制。这期间,众多执政北京的知府、府尹对北京城的治理做出过贡献。下面要介绍的几位,就是洪武、永乐年间的几位顺天府长官,追寻他们的生平与为政,或许可从中对明代北京城的治理情况窥探一二。

方必寿:名不见经传的巴陵乡贤

偶然间看到一个谜语,谜面是:“一纸药书可延年”,打一人名,谜底是:方必寿。

谜语出得挺巧妙,但鲜为人知的是,方必寿其实是明初一位“北京市长”。他曾在明初任宛平知县、北平知府,相当于今天北京市辖区区长、北京市市长。光绪《顺天府志》记载,他于洪武年间“知北平府,有善政。”考其籍贯,为明代岳州府巴陵县(今湖南岳阳)人。那么其人其事究竟如何呢?地方志中的记载如下:

弘治《岳州府志·科甲志》:“方必寿,登洪武丁(乙)丑丁显榜,终按察使。”康熙《畿辅通志》:“方必寿,洪武间北平知府,明敏果断,甚有善政,郡邑翕然称颂之。”康熙《岳州府志·选举志》:“方必寿,洪武乙丑进士。”乾隆《岳州府志》:“方必寿,岳州府巴陵县人,为洪武乙丑年进士,登丁显榜”“知宛平,擢北平太守,历陕西按察使,操履坚确,赫然有声。”光绪《湖南通志·人物志》:“方必寿,巴陵人。洪武乙丑进士,由宛平知县历任陕西按察使,所至有廉介声。”

洪武十八年(1385年)高中进士的方必寿,因为政治原因很少被史料提及。明代是科举取士的鼎盛时期,二百七十多年间,共开科近90榜,共录取进士两万四千余人。自唐代神龙年间(705年至707年),新晋进士们登科后宴集、刻石题名,直到清代都是如此。但洪武十八年的《进士登科录》却没有留存。

据龚延明在《明洪武十八年进士发覆——兼质疑〈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〉》一文中指出:“洪武十八年472名进士中,居然有149名进士,已在太祖朝有犯罪纪录”,“其中有四犯死罪处决的进士王本道、三犯死罪处决的进士罗师贡。显然洪武十八年乙丑榜进士,在洪武间已有臭名昭著之嫌。”不仅如此,榜眼练子宁、探花黄子澄,在明成祖朱棣发动的“靖难之役”中为建文帝出谋划策。此举直接导致朱棣夺位后,将这一年的进士题名碑毁坏,《登科录》也无人再敢刊刻流传。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“北京市长”,他的档案履历也随着这场运动湮灭于历史尘埃中。《明实录》中也未发现关于方必寿的只言片语,真可谓名不见经传。

尽管如此,方必寿其人并没有在历史长河中被泯灭。岳州府巴陵县乡贤祠中,方必寿占有一席之地。乡贤祠是我国传统社会地方祭祀的重要场所,扬善惩恶、激励后进,在传道儒家政治伦理、教化风俗、巩固地方政权方面,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乡贤祠往往设在当地文庙内,和儒学相辅相成。明代乡贤文化繁荣,岳州府本地在宋元时期已经有祭祀乡贤的记载,历史积淀深厚。

今人陈晖昆《探寻岳阳乡贤文化》一文中,对方必寿入祀乡贤祠有所考察。嘉靖年间的岳州府知府萧晚评定乡贤,以《弘治湖广岳州府志·人物志》为基础,写入《人物志》的方廷玉、范瑛、颜公忠、方宗穆、陈渊、杨纲、方昇,应为第一批乡贤首选对象。根据光绪《巴陵县志》记载,方廷玉为方必寿族中晚辈,首列方廷玉,照常理推测方必寿并未入选。到了晚一些的隆庆《岳州府志》,岳州府乡贤有方必寿等十三人,方必寿为首。此后志书、族谱,对方必寿屡有提及。

如今我们从文献的零星记载,结合今人所撰

《湖南古今人物辞典》,依然可以窥探到这些内容:方必寿在明初曾担任宛平知县,当时县内官吏不法,方必寿掌握情况后,对其惩治十分严厉,宛平境内一时肃然。曾担任北平知府,同样有所作为,为政声望很好。至于他主政北京具体事迹如何,还有待文献的进一步发现。

郭仕道:朱元璋特批的进士

第二位要说的“北京市长”叫郭仕道,万历《顺天府志》记载:“郭仕道,江西吉安人”,江西吉安属于今天江西省吉安市。据《万安文史资料》记载,郭仕道是唐代郭子仪的后裔。

说起万安县,大多数人会感到陌生,但是说起文天祥、辛弃疾的两首名作,肯定妇孺皆知。宋代爱国词人辛弃疾任职江西,经过万安造口时,想起金人追杀北宋皇室至此,写下了《菩萨蛮·书江西造口壁》,借青山与流水,抒一腔忠愤之情,成为千古名篇。此外,位于万安县城南的黄公滩又名惶恐滩,自此而上至赣州城北桃源滩,为著名的赣江十八滩。河水穿行于峡谷,暗礁起伏,浪花翻滚,当地人说“赣江十八滩,滩滩鬼门关,十船经过九船翻,一船虽过吓破胆。”特别是黄公滩,最为险峻。宋末文天祥在《过零丁洋》一诗中所说“惶恐滩头说惶恐,零丁洋里叹零丁”,就是指此处。

郭仕道成长在这个人文积淀深厚的地方。据嘉靖《吉安府志·人物志》记载,郭仕道为人“禀性刚介,慷慨有大节,儿时即别处一室,刻意读书,历览子史,洪武间登进士第,授行人司行人,转授齐府纪善,出为襄城县丞,下车之初首询民瘼,兴学化俗,政闻于朝。历顺天府知府,公平刚断,外虽至严而推恕之心刑于政事者尤多。”勤奋刻苦使郭仕道金榜题名,洪武三十年(1397年)他高中进士。但与其他年份的进士不同,郭仕道这个进士是朱元璋钦点的特榜进士。据光绪《吉安府志·人物志》和同治《万安县志》记载,明太祖朱元璋亲自阅览试卷,看到郭仕道的答卷,认为很好,于是赐特榜进士。

郭仕道任顺天府尹的时间,志书中记载和今人学者的考察不太一致。

万历《顺天府志》的记载是“永乐十一年任(顺天府尹)”。同治《万安县志》记载:“永乐时擢顺天府尹。时郡内人民凋敝,仕道抚辑之,越三年,没于官。举入乡贤。”光绪《吉安府志·选举志》记载:“永乐时擢顺天府尹,时人民凋敝,士道抚辑之,二年,歿于官。祀乡贤。”光绪《顺天府志》与万历《顺天府志》记载一致,为永乐十一年。今人张德信《明职官年表》记载,郭仕(士)道,于永乐十三年(1415年)由怀庆通判迁任顺天府尹。并于永乐十六年(1418年)逝世。张德信先生的考证与万历《顺天府志》、光绪《顺天府志》所记载有差别。但根据以上文献可以大致推断出,郭仕道执掌顺天府应在永乐年间,并且任职时间不长,两到三年左右。

笔者偶然在“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”邂逅馆长韩晓燕,韩晓燕介绍,郭仕道有一方进士匾额,就藏在该馆,据说是郭仕道本人题写。但可惜的是,因为馆内展品更替轮换,这块匾额被收入仓库,一时间难以见到真容。但韩晓燕提供了之前所拍摄的一张照片,让我们得以一窥其貌。历经600多年岁月冲刷,或许这是这位当年的顺天府尹在北京留存的唯一实物了。

顾佐:真执法的“顾独坐”

在一众明代顺天府尹中,有一位堪称明代包拯的顾佐,尽管在顺天府尹任上没有完全发挥自身才能,但宣德年间他却成为推动“仁宣之治”的铁腕人物,在他的治理之下,京城世风为之一变。

《明史》记载:“顾佐,字礼卿,太康人。建文二年进士。除庄浪知县。”庄浪县位于今天甘肃省中东部,历史悠久,地处渭水流域,是兵家战略要地。嘉靖《河南通志》记载,顾佐任庄浪知县时,有一年端午节,武将们召集官员比赛射箭,大家以为顾佐一介文人,肯定不善骑射,于是故意让他射箭来刁难。谁知顾佐“连发三中,人由是异之”,守将们也从此心服口服,可见这位进士知县并非文弱书生。

顾佐在永乐初年便担任了御史一职,御史乃监察官,负责监察百官业务。很快顾佐得到明成祖朱棣的信任,先后在北京行在负责监察任务、监督四川采木、随军北征等。

《明实录》记载,永乐十八年(1420年)十一月,“改应天府尹顾佐于顺天府尹”。应天府即南京,在永乐十八年(1420年)之前,明王朝的正式都城是南京。永乐十八年九月初一,北京宫殿正式竣工,明成祖朱棣接受四方朝贺,此时仍称“北京行在”,随后命令北京行在礼部,以永乐十九年正月初一日起,以北京为京师,定为正式国都。因此可知,顾佐先后为南京、北京两都最高行政长官,于1420年末执政北京。其为政能力不言自明。

但是,顾佐刚直不阿的性格使他在北京的仕宦生涯并不顺利,京城的权贵们对他甚为忌惮,甚至联合起来将他排挤出京城,到天高皇帝远的贵州去做按察使。宣德三年(1428年),大学士杨士奇、杨荣举荐顾佐,称赞他“为京尹,政清弊革”,将他在京为官时的表现一番夸赞。宣德皇帝励精图治,正在寻访良才,于是很快提拔顾佐为右都御史,并令他专门督查各御史,就这样,顾佐又重拾监察任务,干起了老本行。实际上他成为宣德皇帝整顿官场腐败、肃清吏治的执行者。

顾佐毫不客气,上任没多久就刀刀向内,先拿御史机构都察院开刀。《明实录》记载,宣德三年八月,顾佐一纸奏章,“奏监察御史严愷、成林、韩瑄……贪淫无耻、污名尤甚”,“张观、王成雷……贪污不律”“李孟宣、王颐……都事赵玘不达政体,赵安不谙文移”,林林总总,弹劾了不下25人。不仅如此,他的上司左都御史刘观也没能逃过银铛入狱的命运。刘观起初并不认罪,向皇帝求情,殊不知宣宗皇帝已经掌握了他贪赃枉法的确凿证据,顾佐正是在皇帝的支持下采取的行动。

对刘观等官员的处理使得都察院风气为之一变,顾佐反腐倡廉的重拳出击也带动了各级监察部门,一时间朝纲整肃,京城的社会风气也有了明显的转变。明人沈德符在《万历野获编》中说,“京师自宣德顾佐疏后,严禁官妓。”可见顾佐为政效果之显著。

《明史》对顾佐的品行有较高的赞誉,说他:操履清白,性严毅。每次上朝之前,顾佐都自己一个人独处,“非议政不与诸司群坐”,也许是人至察则无徒,其他官员经过附近“皆折旋避之”。久而久之,官员们都管他叫“顾独坐”。

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,这位真执法的“顾独坐”既为北京的治理贡献颇多,也堪为后世垂范,令人钦佩。

来源:北京晚报